

论“三维双向”增长范式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兼议“经济人假设”变异和传统经济增长范式更替

曹振良

一、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人类将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以知识经济为特征,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这一方面标志着人类智能的开发、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划时代的崭新高度,并预示着全球经济将沿着一体化方向继续向前发展,人类社会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但另一方面是“经济过剩”寻求扩大国内外市场与供给不足并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自然资源再生能力跟不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有人预测,从国际范围来看,环境难民人数将超过战争难民。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经过短短 20 年赶超高速增长,使资源约束型“短缺经济”发展成为产品、生产能力和技术(转化少)“全面”过剩型经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扩大内需,寻求新的市场,同样成了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我国也成了全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严重制约和威胁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们的生存。面对上述严峻局面,全球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人类这一崇高发展目标,不能不对造成国内外这种严峻局面和阻碍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增长范式及其理论支柱“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探讨新的理论支柱和新的增长范式,即由传统单一物质资本供给推进型“一维单向”增长范式过渡到新的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知识资本三者整合协调增长,且供给推进与需求拉动并行的“三维双向”增长范式。

二、传统增长范式及其所引起的反思

美国学者库恩指出“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式”,它作为一个时期被公认的科学研究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范式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其产生和存在标志着一门科学的成熟;范式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库恩,1980,19、12、8 页;张夏华,1996,463 ~ 464 页)。可见,一种科学范式的形成既标志着该学科领域突破性发展,同时预示着为其新的突破和新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例和方法。然而,科学范式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相应学科理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更替和变异,在更高层面上推动该学科继续向前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的一般逻辑与规律。

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范例或规范不仅存在或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同样也存在或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在经济

科学中,传统经济增长范式就是一例。所谓传统经济增长范式,是指自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以来,以扩大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核心,以增加物质财富为唯一目标的供给型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总和,即“一维单向”增长范式。它包括增长的理论支柱——经济人假设、实际经济增长途径和增长模型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它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增长思想,完成于哈罗德—多马等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在这一个过程中它依存并指导全球各国经济的增长,孕育并产生了“增长(发展)经济学”,推动着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下面简要地分析其三个组成部分:

(一)经济人假设是传统增长范式的出发点和理论支柱

经济人思想首先萌生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以经济人思想或假设亦即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支柱和出发点。所谓经济人简单地说就是“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进一步解释为三层意思:其一,“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人行为的根本动机,而这种动机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是人的“自然权利”;其二,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会从自身利益和处境出发,根据市场情况,在经济法则(无形之手,边际原则等)作用下,对自己的经济行为作出判断和决策,从而使其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其三,“自利”和“利他”的兼容性,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核心命题。”被米尔顿·梅尔斯称之为“经济人的灵魂”(杨春学,1998,11 页),随着理论和实际的发展,有的学者对经济人概念又作了新的界定,提出了“广义经济人”和“新经济人”等概念。所谓“广义经济人”就是把经济人理念从商品性领域扩展到“非商品性领域”;所谓“新经济人”就是经济人的“个人利益”不仅包括纯粹物质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非经济利益,并在个人的行为活动中按“成本—收益”原则进行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的比较(杨春学,1998,12、208 页)。

然而,尽管“经济人”理论支持者有上述种种解释,但是由于“经济人”和“经济人假设”既是传统增长范式的直接出发点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同时又直接与人性这个最敏感而古老的问题有关,所以自经济人思想萌生至今,一直存在非议和争论。首先是来自传统宗教和伦理道德的非议,认为“自利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定位为“自利”,与“人本质上是利他的”伦理道德观不相容(杨春学,1998,2 页);其次是围绕“斯密问题”或“斯密矛盾”引起的争论。所谓“斯密问题”争论,即对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关于人的本性与《国富论》中

关于人的本性的思想是否一致的争论。有的认为《道德情操论》中的人性是“利他”的，而《国富论》中的人性是“利己”的，二者不一致；有的认为二者是一致的（朱绍文，1987）。由这种分歧进而引致对经济人假设的争论。再次是来自经济学内部的争论，公开的大争论有三次：第一次是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第二次是20世纪40年代关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争论；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的争论（杨春学，1998，174、188、200页）。

在我国也开始注意对经济人理论的研究。如朱绍文先生、赵德志先生于1987年就分别发表文章进行讨论；杨春学（1998）在他的《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中，对经济人、经济人理论抽象及其发展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历史评价；还有的同志提出应当重视“经济人假设”问题的研究（王东京，2000）。但是，更多的学者持否定态度，从不同角度提出异议。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人”即“自私人”，提出用“利益人”取而代之（程恩富等，2000），还有的学者提出用“可持续发展”（刘思华，1997）、“集体经济人”、“价值最大化”（熊峰，2000）等代替“经济人”或“经济人假设”。

对此，我们想指出以下几点：

(1)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人”不论是作为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具体人，还是作为理论抽象的经济人学理念，永远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与经济学要研究人，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原则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离开了人，对人类来说可持续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

(2) 经济人的“自利”追求，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内在本质的物质表现。我国有的学者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因而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杨敬年，1998）。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按照市场规则，通过公平竞争、公平交易追求“自利”，争取利益或效益最大化，符合商品经济的伦理道德。同时，市场经济也无需“利他主义”情感，这是因为，“市场上的信息是由价格传递的，是货币在说话。市场制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市场参与者之间有复杂的交流，更无需表现出‘利他主义’的情感，它只要求交易双方承认对方的产权和遵守交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节约的正是人性结构中最稀缺的‘利他’这种资源”（杨春学，1998，317页）。这里似乎还应指出的是，在人类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或个人，或群体，或民族、国家）自身智能结构的差别，作用对象——自然客体的差异，和制度安排的不同等，各主体获得的利益有差别，甚至悬殊，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差别。然而这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试图用超越时空的制度安排，或超越时空的伦理道德，或尚不存在的、所谓“全球伦理”，来消灭或烫平这种差别都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3) 也是最重要的，正由于经济人本质上是历史地给定的，加之自身固有的缺陷，所以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发展，即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经济人”自利追求的内涵也将发生变化，作为其理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也将随之发生变异，相应由其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范式也将发生更替。对此，后面还将论及。

（二）传统增长范式的经济增长途径

此指传统经济增长范式的实际应用过程。传统增长范式正是从上述经济人理念出发，运用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增

加生产要素，提高其生产能力，以扩大商品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早在18世纪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说过，国民财富就是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其源泉就是劳动；财富的增加就是劳动工人的增加和在业工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由于不论是增加劳动力，还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加强劳动分工使用机器，都需增加资本投入，故资本就成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近200多年来正是斯密的上述财富及其增长途径的基本思想，构成了传统增长范式的核心内容，指导着各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的范例，并作为定律概括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可定义为向她的人民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物品这种能力的长期增长。

正是这种增长途径，在使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的同时，带来了生产要素自身一系列重大的变化：（1）生产要素由劳动力“一要素”，扩展到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的“三要素”，进而扩展到融入科学技术的“四要素”，或“五要素”（含管理）；（2）科学技术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或中性常量，变为内生变量；（3）各生产要素的作用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劳动力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时代开始，依次发展更替为：土地第一要素时代（一般指农业社会），资本第一要素时代（一般指前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已进入科学技术第一要素的时代；（4）劳动者从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扩展到兼及人力资本的载体；（5）土地的用途从纯自然力作用的发挥，如承载（重）用地、养力用地（种植、养殖等）、富源用地（矿藏等），扩展到兼及金融工具（证券化对象）等职能；（6）资本从“中介”实体经济并依托实体经济运转，发展到90%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符号经济”或“虚拟经济”而“独立”运转；（7）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从单纯提高生产能力的功能，扩展到兼及直接核算折股成为（经营）资本的职能。此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依次经过人受自然奴役的阶段，人“征服”自然的阶段，发展到要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阶段。所有这些变化既标志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预示着传统增长范式及其增长途径的更替势在必然。

（三）传统经济增长范式的增长模型

生产要素及其生产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分析，是传统增长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细的部分。经济增长计量模型的产生既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传统增长范式走向成熟和完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之后才能达到完美的地步。这些模型首先是形成于20世纪40-5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的模型的基本点是描述和说明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源于斯密的资本理论，在理论界称之为“资本积累论”，即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用生产函数公式表述就是：

$$Y = f(K, L)$$

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

其次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索罗模型。该模型不同于哈罗德模型，其基本点是，经济增长除了资本、劳动力因素外，还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因素，并测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87.5%，从而确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简称为“技术决定论”后来丹尼森进一步证实了索罗模型，用生产函数公式表述就是：

$$Y = f(A, K, L)$$

其中A指技术进步。再次是以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各种形式的所

谓“新增长理论”模型。1961年舒尔茨运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将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从而科学技术也分为物化科学技术和人格化科学技术,前者为机器设备等,后者即人力资本。随后出现的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都是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数量上的具体化描述,一般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论”。基本函数公式是:

$Y = f(H, A, K, L)$, 其中H指经过训练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不但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还提出生产要素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故一般又称之为资本“收益递增论”。

上述这些模型尽管有它们的不足或缺陷,有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但是从整体来说,我们认为:(1)这些模型的出现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定量分析的先河,既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学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传统增长范式走向成熟和完备;(2)这些模型的形成虽然晚于传统增长范式其他两个方面,并且基本都形成于20世纪中期,但是它们反映了经济增长向前推进和各生产要素及其作用地位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即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模型、卢卡斯模型基本反映了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各自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依次发挥主导或第一要素作用的历史进程,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从而显示了传统增长范式结构的完备性;(3)有的模型可以继续为新的增长范式所借鉴,如卢卡斯模型等。

以上是我们对传统增长范式及其三个组成部分所作的简要分析。历史地整体来说,其形成、发展和完备,对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理论经济学内容,创立增长(发展)经济学等都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严重挑战。而这些又正是其“一维单向”增长模式所致。

第一,来自生态环境方面的严重挑战。这种增长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生产者内部生态环境成本社会化。由于它是掠夺性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毁灭性地向自然排放废弃物,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严重的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酸雨蔓延;日益恶化的资源短缺,如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其所带来的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以至于全球的气候变暖和臭氧层的破坏等。这些都是传统增长范式“作茧自缚”,自作自受。现在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育。另据国外研究组估计,如果全世界人都按北美人的速度向空中排放污染物,那么,人类至少还要9个地球(或9个大气层),才能安全地吸收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吴刚,1999)。

第二,来自市场的挑战。有效需求不足始终是困扰传统增长范式严重问题之一,在其历史进程中不仅没有应验“萨伊定律”,就是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政策似乎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现在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刚起飞的发展中国家都程度不同地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就其深层根源来说,与“一维单向”增长途径有关,这一方面还是由于这种增长途径的负外部效应,生产者的内部成本外部化,自然生态资源近乎无偿开发利用,这样生产者用智能含量和工资成本极低的人类劳动,就能生产“丰厚”的物质产品,所以疯狂地“增产”,直至牺牲环境,用生态“赤字”换来物质资本(产品)的“过剩”,其实是“肌肉经济”与“资源经济”的“过剩”。另一方面由于是“一维”增长,缺乏用“过剩”物质资本生产或转换成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以改善生态环境和增强人的智能素养的内在机制,相反是通过牺牲人类对生态环

境和知识文化的消费(享受),甚至“抑制”人的物质产品消费,来“保证”物质资本(产品)的过剩,“呈现”有效需求“不足”。

第三,来自传统增长范式内部的挑战。这除了其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遭到非议外,还有其分析方法的问题。前面已说过计量分析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分析推导有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形式化的趋势,对解读当前经济增长(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生态危机和经济“过剩”等经济现象无补,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

第四,来自新的增长(发展)理论的直接挑战。这主要是“增长的极限”论,和“可持续发展”论。这两种理论都是20世纪70年代针对传统增长范式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自然资源面临耗竭等负面影响提出来的,在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但是,前者主张“零的增长”,过于悲观,也极不现实,实际全球经济仍在加速增长。后者主张资源、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持续协调发展,无疑是正确的,其核心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又在于传统增长范式的更替与创新。

三、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要求更替传统增长范式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已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也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据。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其实现的核心是什么,与传统增长范式是什么关系等都需深入探讨。我们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又是传统增长范式的更替和变异。

可持续发展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酝酿中,但是作为定义性用语是1986年联合国环发会议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即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于1992年又通过和发布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21世纪议程》。我国也于1994年就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确切定义和内涵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有人统计,截至1996年国内外已有180多种定义或表述(刘思华,1997)。从其涵盖的内容来说,有的侧重于资源和生态环境,有的侧重经济,有的侧重社会,有的侧重科学技术;从其涉及的空间地域来说,有的侧重一个地区,有的侧重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有的则从全球出发;从时间维度来说,有的侧重现在,有的着眼未来;从人类自身内部关系来说,有的侧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纵向关系,有的更关心当代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等等。根据上面所涉及的维度和内容,我们可以给可持续发展下一个内涵更为包容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凭借科学技术,保证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代内人之间,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协调发展。”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个具有多维度多层次内涵极其丰富、意义厚重的“立体”交叉型概念。涉及到哲学、人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等。但是最基本的是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本质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核心又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

1. 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首先得到发展,才能有真正的社会发展,才能谈

得上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才能谈得上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可以提供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只有经济得到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发展,萌生更多的制度创新,而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又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三是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可以直接孕育和生成、积淀更多先进的社会文化;四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更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

2. 优化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前提。在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U曲线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起飞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是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而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生态环境状况停止恶化,并开始好转优化(见下图1)。并有实证测得:人均收入达到800~1200美元时,毁林破坏环境的情况停止,倒U曲线进入拐点。但是污染物排放影响生态环境进入拐点相应的人均收入是3000~5000美元,大大高于前者(潘家华,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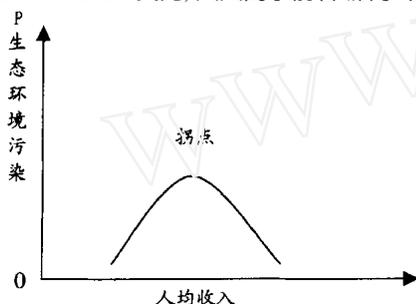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经济发展作为优化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表现在:其一是偿还生态资本赤字,即已遭到破坏的生存环境得到治理,有赖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金积累和治理生态环境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二是实现“清洁生产”,进而实现生产过程的污染“零排放”,需要经济的发展。具体经济过程是:要使生产过程中无环保处理所造成的“公害”而增加的外部“社会成本”,转化为生产过程中增加环保措施实现“清洁生产”企业的“内部成本”,即“外部成本内部化”,需要发展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为这种转化创造经济和技术条件;其三是防治或防御生态环境自然(非人为)损坏,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和新的科学技术;其四是优化和美化生态环境,形成生态资本积淀或积累,提升生态环境等级,需要增加人工营造生态环境,改善人们的“生态需求”,更需要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在资金和技术上提供保证。

3. 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基础。在传统增长范式条件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呈扩大之势,“贫困”已严重制约着可持续发展。有人认为,“贫困首先是指一个特定人群智力结构的低层次(可区分为绝对低和相对低两种形式),其次才是指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叠加在低层次的智力结构上导致收入不足,以致于不能进行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和服务消费”(向恒,1998)。智力结构一般是指人的文化水平、知识层次、思想观念、劳动技能和心理素质等因素的组合。我们认为,上述贫困根源的分析具有普遍意义,一般来说既适应国际之间贫困基本原因的分析,也适用国内地区之间贫困基本成因的分析。因此,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在调整或优化国际经济环境(秩序)的

同时,利用知识经济兴起的机遇和后发优势,发展教育,引进科学技术,提高本国和本地区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走知识型经济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失为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正确选择之一。我国自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对西部除了必要的(区域)政策倾斜和必要的财政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帮助西部发展教育,强化科技研究开发,培养高级人才,普遍提高区域内人民的智力结构。

总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传统经济增长范式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克星和桎梏,因此,传统经济增长范式更替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是唯一的选择。

四、构建新的增长范式—— “三维双向”增长范式的探讨

任何一个学科及其研究范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传承性,同样传统增长范式的更替创新也不能超然于原来的增长范式,不能离开其三个组成部分。

(一)“经济人假设”内涵的变异是传统增长范式更替的根本原因和新增长范式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经济人”或“经济人假设”内涵其所以要发生变异。总的来说是人的需要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的本性的变化所致。即要从人的需要和人的本性内在联系中寻找变化的根源。马克思曾说过,“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里马克思不仅强调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同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说过,“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这样在人类需要、人类本性、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人类历史之间就存在一条理论逻辑链,即人类需要变化—人类本性演变—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进步—人类历史发展前进。在这个逻辑链中,人的“需要”是基础,是本源。“需要”的变化,相应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自利”追求的内涵以及由此而发端的“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由经济人理念所决定的增长范式也要发生更替。在这里就是由单一物质资本“一维”自利追求,变为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知识资本“三维”自利追求,而关键是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会成为“经济人”的直接自利追求。

1. 生态资源资本化,并成为“经济人”的自利追求

为了较具体地说明上述“变异”的机理和过程,我们将作为范畴的“需要”区分为“自然需要”和“自为需要”。所谓“自然需要”是指需要的对象是天然形成的,是自然的恩赐,以需要主体的本能活动来满足;所谓“自为需要”是指需要的对象是通过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来满足。人在成为人以前维持其正常运转(生存、发展)的完全和生物(除人以外的狭义生物,下同)一样,是靠“自然需要”的满足。只有当自然界发展出了人以后,人才“获得了自我意识”,人才成为“具有智能的存在物”,而在这一发展或进化过程中,人除了“自然需要”外,还有“自为需要”,同时后者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程度也逐渐增大。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兼备的存在物。但是只有“自为需要”才是人的真正本性特征,才是人和生物的本质区别,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从而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说过,人的“需要”不同于动物的需要,但是他没有从概念上将二者区分开来。其实从概念或范畴方面将“需要”区分为“自然需要”和

“自为需要”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证意义。例如：(1) 能更直接准确地区分人的需要和生物的需要不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和生物的本质差别，从而能更深刻地揭示“人的需要既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必然要满足)，又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体现”的学术主张(杨敬年,1998)，亦即能更深刻地揭示人的内在本质。然而，现实中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两种需要”及人的本性和生物的本性混为一谈的现象。如有人认为，需要作为一般范畴，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有机体的共有的一种特性……(陈志尚等,1998)。又如：一当有人从人的需要内在本性出发，强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利益时，往往被斥之为把人“当作”了“动物人”或“经济动物”等等。(2) 人学方面的意义。例如，能更直接地揭示人的本质的物质性，从而更有利于理解关于“马克思彻底改变了强调思想是人的本质的旧哲学传统，把人的本质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学术观点(韩庆祥,1996)；有利于开展经济人类学研究等等。(3) 经济学方面的意义。例如，能更直接地从需要与人的本质的内在因果连接上，来研究需要(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原作用力；经济发展时代的区分既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即用什么生产)来划分，也可以生产什么为标志(即生产什么)来划分；有利于揭示经济行为主体“经济人”的本质及其自利目标追求和变异等等。(4)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警示现代人，我们虽然能用自己的智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文化，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自为需要”，但是千万不能忘记，人作为“自然自在物”仍有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需要”，因此要倡导、建设、传承生态文明，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同时，通过千秋万代艰辛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知识、制度)文明也将荡然无存，失去存在的意义。

正是由于人兼有“自然需要”和“自为需要”，从而一方面，人作为“自然自在物”要参与自然生态循环，并在自然生态循环中，实现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自然需要”；另一方面，人作为“获得了自我意识”的智能存在物，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其对物质产品等的“自为需要”，并形成一种依托自然、相对独立的生产循环系统，即人类满足“自为需要”循环系统，简称“人类循环系统”。这样在自然生态循环系统中就嵌入了一个“逆”向的“人类循环系统”，出现了“自然生态循环系统”(A)与“人类循环系统”(B)并存的格局，简称“双循环”。从自然生态平衡、人类生存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都要求“双循环”均衡协调运转。但实际并不都是这样，这是因为：在“双循环”过程中，一方面“自然生态循环系统”作为一种“顺”循环会形成一种包括对人类排放的废弃物有吸纳、降解作用在内的再生力(X)，通常情况为常量；另一方面“人类循环系统”作为一种“逆”循环要依托自然，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向自然排放废弃物，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产生一种对自然的破坏力(Y)。由于再生力(X)和破坏力(Y)对比不同，从而使“双循环”处在不同匹配运转状态。一般有四种组合运转状况：其一，在无环保措施条件下， $X = Y$ ，“双循环”处于自然均衡协调运转状态，简称“双循环”I。自人类出现至工业化初期，“双循环”基本处于这种状况(见图2之I)。其二，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在无环保措施或环保措施不到位条件下， $X < Y$ ，“双循环”处于非均衡不协调运转状态，简称“双循环”II，这正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严酷现实(见图2之II)。其三，虽然人口和社会经济继续增长，但环保措施完全到位，减少“人类循环系统”的破坏力(Y_1)，增加“自然生态循环系统”的再生力(X_1)，使 $(X + X_1) = (Y - Y_1)$ ，实现“双循环”人工均衡协调运转，简称“双循环”III。这是人类当

前急切期盼和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见图2之III)。其四，在科学技术进步，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和环保措施更加到位条件下，在更高层次上优化生态环境，使 $(X + X_1) > (Y - Y_1)$ ，实现“双循环”人工优化运转，简称“双循环”IV，使人类享受更优美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这是人类的理想，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有可能成为实现(见图2之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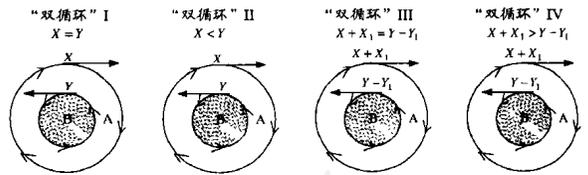


图2 自然生态循环与人类自我循环“双循环”示意图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双循环”II，从整体来说，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Y)大于自然生态的再生力(X)，出现了全球性“生态赤字”，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样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除了“自然需要”外，还要靠“自为需要”来补充，即“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并存。为实现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自为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保”产业化、生态资源资本化就势在必然，“环境经营”时代已来临，环保工作已经与财务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市场活动能力并列，成为企业竞争力之一，并出现了“环境会计”，对环境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进行环境统计和环境经济核算。据科学家按“生物圈2号实验室”造价推算，人类要建造适宜于目前人类生存的全球生态环境，至少需要耗费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万倍的物质财富。所以生态资本是巨大的财富，必然成为“经济人”的自利追求。“生态环境已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刘思华,1999)。

2. 知识资本化，并成为“经济人”的自利追求

知识资本化，并成为“经济人”的自利追求，相对生态资源资本化并成为“经济人”自利追求来说，显得更为明显突出。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科学，是广义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也指人文社会科学。人类知识活动已有几千年了，但是提出和论述知识资本(有的也称“知本”)问题还是近期的事。论著虽然不少，至于知识为什么资本化，从我们掌握的文献看，还不很清晰，还值得研究。对此，我们想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知识对人类满足“自为需要”变得越来越重要普遍，同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知识资本化的前提，主要表现在：

(1) 科技知识作为拓宽、增加、改善人类“自为需要”的源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靠科技创新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拓宽人类“自为需要”的范围周期越来越短；通过科技革命开辟新材料新能源和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人类“自为需要”的数量变得更为平常；提高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提升人类“自为需要”的品味更是科技进步及其精细化。

(2) 今天科技知识又成了人类实现生态环境“自为需要”的基础。这除了要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为“环保”或生态资本“生产”提供足够的资金和物质基础外，更重要的是直接为这种“生产”提供先进适用的科技服务。诸如被破坏生态环境修复和建设，替代资源生产、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其自然损坏，实现“清洁生产”、人工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等方面的科技服务。造成当今“先污染后治理”或“只污染不治理”的局面，科学技术水平跟不上是重要原因之一。

(3)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满足“自为需要”制度保证的基础。“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些概括都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些都是就科技知识而言的。然而，知识作为力量源泉的脑力劳动产品，是不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二者都是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力量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制度创新的基础，所以其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人类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满足物质文化方面的“自为需要”，越来越崇尚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保证，“归根结底取决于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实现“自为需要”制度保证的基础。

(4)知识作为人类直接“自为需要”的对象更加明显。人类对知识的需要，有间接“自为需要”和直接“自为需要”之分，前者是把知识作为满足“自为需要”的手段；后者是把知识作为直接满足“自为需要”的对象，即知识(文化)的直接消费享受。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在不断增加物质“自为需要”及其知识含量的同时，对知识的直接“自为需要”和作为个人“财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快速增加。今天个人学习求知不只是为了获取谋生手段的单一目的，同时还有满足个人直接“自为需要”的因素，而后的份量将逐渐增加，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增加个人知识文化素养是现代人的时尚追求，相应个人的知识投资也增加。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说，知识生产过程亦即知识消费过程。

第二，知识产品私有性凸显，是知识资本化的基础。首先知识具有公共品性质，它一生产出来就存在全球公众充分利用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知识生产者很难把知识创新成果完全占为己有；知识产品的消费不具有完全排他性，即不影响别人的消费；增加知识消费的边际成本等于零；知识消费不会使知识损耗或减少，反而会增加；知识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等。但是随着科学向纵深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加强，企业加大了R&D投资，知识产品的私有性凸显。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争取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抢先发表的同时，又有把该项成果的细节或关键环节进行保密作为专利归自己所有的可能；尽管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公共知识产品，但是消费者要实现对它们的消费，自身必须有一定的R&D投资和知识积累；科学知识创新尤其是技术知识创新有的不能译成“电码”要靠创造者自己长期R&D投资和积累；更重要的是在人类长期的知识活动中，保护知识产品私有性的法律环境已形成，维护和尊重个人知识产权已成了全人类的共识等等(袁志刚,1999)。正是知识产品这种公共性和私有性的兼容及其矛盾性促进了知识资本化，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第三，知识产品的价值增值功能，是知识资本化的核心。资本的本质是带来价值增值。知识作为力量源泉的脑力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和价值转化的源泉和“催化剂”。知识或知识资本有各种分类方法，从其价值创造和价值转化功能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物化的知识，即机器设备等，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功能主要是实现价值转化，包括将自身的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转化到产品中去，价值转化量一般与物化知识自身的价值和转化对象的价值成正比。在这里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价值增值。

其二，以无形资产形式存在的知识，如专利等。对这种知

识如何实现价值增值的机理有各种解释。这里介绍三种：(1)认为这种知识是复杂脑力劳动产品，其价值是“潜在的价值”，并“具有倍加效应”，通过转化或交换变为现实的倍加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值(艾德文,1999)；(2)认为这种知识的价值“不会在使用中消耗或磨损”，被“复制到产品中”去，即重复转移实现价值增值(白连生,1999)；(3)认为这种知识价值是一种软价值，并遵循“软价值垄断转化规律”，即通过垄断转化获得超额利润，实现价值增值(黄锦奎,1999)。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我们认为应该是上述三者的综合，即首先这种知识是复杂脑力劳动产品，隐含较高的潜在价值或软价值；其次这种形态的知识是尚属私有性知识产品，所有者拥有垄断权；第三，它的价值能重复转化“复制”，能实现价值增值。

其三，人格化的知识，即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它是最大最具活力的价值增值“源”。因为不论是人力资本的培育积累成本，还是直接引进“人才”的投资相对人力资本在使用中所创造的价值来说，都是“一本万利”的事。

第四，知识自身的评价及其统计和经济核算要求知识资本化。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知识及其演绎形态或形式——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并将继续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实际经验中都越来越认识到“科技是把双刃剑”。人们对“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就一定要将它实现”的传统技术逻辑提出了质疑，我们认为可以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开发利用要慎重筛选”新的技术逻辑取而代之。这样势必要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评价，包括自然伦理道德和社会伦理道德评价，因此在科技投资和科技开发利用时，要对其正负效应，远近期经济效益，生态、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等进行多维评价，进行纷繁的统计和复杂的经济核算，从多角度探讨知识的真正增值能力。

第五，人类知识活动或生产进入产业化，即通常所说的科技产业化，信息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等。这些既是知识资本化的条件，也是知识资本化的表现。上述情况表明知识资本化，并成为“经济人”的自利追求势在必然。这不仅表现在科技(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早已载入增长经济学，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根据前面知识资本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给知识经济下一个新的定义，即知识经济是指以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增进人的综合智能素养，以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为依托，发挥知识资本的本源作用，推动物质资本、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整合协调增长，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现实中，知识资本评估统计工作也在积极研究探讨中，1995年5月，瑞典的斯堪地公司就公开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知识资本(智力资本)年度报表。

正是由于环保、教育科研产业化，生态资源资本化和知识资本化，并都成为“经济人”的自利追求，这样不论是具体的“经济人”，还是理论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其在经济活动中的目标预期就不再只是单一的物质资本最大化，而是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知识资本三者整合最大化，即不论从经济增长理念来说，还是从实际经济增长途径来说，也不论是从微观基础企业来说，还是从宏观层面来说，都由“一维”目标追求过渡到“三维”目标追求。这既是传统增长范式发生更替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是构建新增长范式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为了表明“经济人”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并与前面所提及

的种种“经济人”相区别,以及论述的方便,我们将亚当·斯密18世纪中叶在写《国富论》时,所论述的单一物质利益追求的经济行为主体,称之为“经济人”;而此前的自然经济时代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济行为主体,称之为“前经济人”;而把这里所说的物质资本、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三维”追求的经济行为主体,称之为“后经济人”。人类将沿着“后经济人”的自利目标追求,继续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二) 新增长范式的实际增长途径

总的来说是按照“后经济人”理念,全面推进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知识资本整合协调增长。具体途径和过程是在继续高质量推进物质资本增长的同时,通过科技产业化、信息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通过生产经营单位广泛推行R&D(研究与开发)、个人干中学等途径,实现知识资本高速增长,使其在保证和推动物质资本、生态资本增长需要的同时,形成自身的积淀,以保证人们对知识的直接“自为需要”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剩余。通过生态环境资源资本化,通过治理生态环境,实现“清洁生产”、防御生态环境自然损坏、营造人工生态环境等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措施,实现环保产业化,促进生态资本增长,以改善和优化“双循环”运转状况,并增加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直接“自为需要”(享受)。“三种资本”增长及依从关系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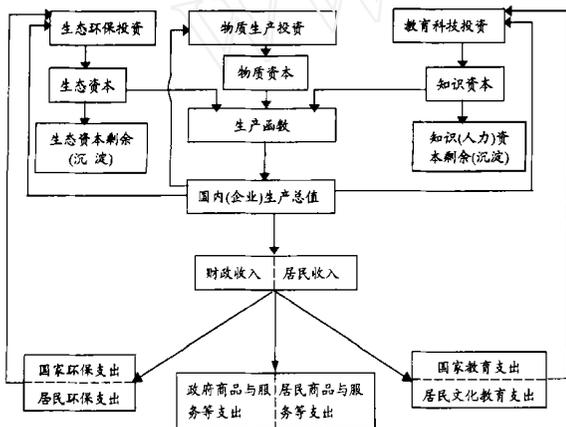


图3 “三种资本”增长及依从关系示意图

这种增长途径的基本特点是:(1)以“三种资本”作为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基础,同时整合协调增长,以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其基本协调或组合关系是:以知识资本(科技)和生态资本(环境)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推动物质资本增长是基础;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协调增长,逐渐改善和优化“双循环”运转状况;知识资本优先增长,它除了保证物质资本和生态资本各自增长的需要和积淀外,还应有自身的“剩余”或积淀。

(2)人的智能开发是“三种资本”增长的基本或唯一“能源”。“三种资本”整合协调增长的过程,实际是生态能、物(质)能、智能相互转化积淀的过程。在这里“能”的终极来源,或“终极能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生态循环”中所形成的再生能(力);另一个是人类智能的开发。但是前者要被“人类循环”所产生的破坏力(能)所抵消(实际也是转化为“物能”),甚至出现“赤字”型转化。而后者“智能”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三种转化或积淀:一是转化为物能,并使其形成积淀,以实现物质资本的“净”增长;二是转化或补充生态能,并使其形成积淀,以冲抵“人类循环”的破坏力,改善和优化“双循环”运转状况;三是形成自身的积淀,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剩余和个人对知识的直接“自为需要”。所以,从这种意义说智能

是“三种资本”增长的基本或唯一“能源”。

(3)“双向增长”性,即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并存性,有“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因素,有利于实现供需平衡。首先这种增长范式是从人的本质特征“自为需要”出发而形成的,基础是不断更新、增长的“自为需要”;本质上是需求决定增长,即经济增长理念是需求拉动“以需定产”;其次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这一方面是人类对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有了直接“自为需要”;另一方面是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社会积淀,标志着生态环境优化升级和人的智能素质的提高,这些是人类共同期盼,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积淀越多越好,有“无限”的需求;第三有促进物质资本供求平衡的机制因素,这主要是“三维”整合协调增长的制衡机制:一方面是“三维”增长制约着物质资本过分膨胀,另一方面是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生产和增长,增加了对物质资本的需求;第四物质资本是人类“自为需要”的主体,并且不断更新换代,随时有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增长点出现,而“两点”对称,恰好是“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的理想“双向增长”模式。总观上述四点,“三维”增长范式,亦可视为“三维双向”增长范式。

(三) 新增长范式的增长模型

传统增长范式的思想理念和实际增长途径基本是同时产生的,然而,其增长计量模型是过了100多年之后,才逐步形成。作为新的“三维”增长范式的思想理念和实际增长途径虽有以上分析和构想,但尚需深入探讨,更重要的是实践的检验。至于其计量模型怎么构建,难度更大,更有待深入探索,尤其是将计量分析落实到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统计与经济核算,以及“三种资本”整合统计与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就更为复杂。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增长的理论模型进行大致的构想。总的思路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三种资本”各自独立的生长模型。可在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把生态环境(G)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加入其中,这样三种资本 $t+1$ 期增长模型就分别为:

$$\text{物质资本: } K_{1,t+1} = f_1(K_t, L_t, H_t, A_t, G_t)$$

$$\text{生态资本: } K_{2,t+1} = f_2(K_t, L_t, H_t, A_t, G_t)$$

$$\text{知识资本: } K_{3,t+1} = f_3(K_t, L_t, H_t, A_t, G_t)$$

K_t, L_t, H_t, A_t, G_t 分别代表三种资本在 $t+1$ 期初始的资本,劳动,技术,人力资本,生态环境投入。

(2)“三种资本”整合(加总)增长理论模型,即 K_1, K_2, K_3 的“加总”模型:

$$\Sigma k = f(K_1, K_2, K_3) = f(K, L, H, A, G)$$

(3)三种资本结构(比例)增长模型,即:

$$K_1 \quad K_2 \quad K_3$$

这实际是一个经济增长结构模型,对此我们将在下面作简要分析。

五、“三维”增长范式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

“三维”增长范式既是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同时又是经济结构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当前我国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这里我们从一种新的角度和新的层面提出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知识资本“三维”经济增长结构问题。

(一) 构建“三维”经济增长结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三维”经济增长结构理论,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人理念,即“后经济人”理念,经济行为主体的直接目标预期,不再是单一物质资本最大化,而是“三种资本”整合最大化;同

时由于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正外部性明显,经济行为主体“自利”性与“利他”性的“兼容”,更具内在必然性,从而更具主观自为性。(2)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财富观。确立了生态和知识是资源、是商品、是市场的观念;形成了“三种资本”共同构成国民财富,表征综合国力的理念。(3)“三维”增长结构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理论,能更综合,更深刻地揭示一个经济结构的状况和质量。它凸显了经济增长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凸显了人的智能与经济增长及其质量的关系;凸显了人的“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的结构关系;凸显了人类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学基础。(4)推进和优化“三维”增长结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拓宽和夯实增长基础,提升经济增长平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最根本、最现实的战略选择;是改善自然和人类“双循环”运转状况的根本措施;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有效途径;是新经济时代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所在;是沟通和实现知识与可持续发展内在连接的桥梁等。

(二)我国“三维”增长结构实证分析

直观我国当前“三维”增长结构,总的格局是: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增长严重滞后,生态资本非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严重“赤字”;知识资本不仅没有超前增长,反而落后于物质资本的增长;物质资本虽有长足的增长,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以牺牲和抑制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增长为代价“换来”的。从整体来说,仍以“肌肉经济”和“资源经济”为主。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物质资本增长一直保持较快的速度,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问题,并且形成了“积压”,其发展反而受到市场需求不足的制约,这是非常可喜的事。但是,从“能”的转换角度来看,物能的形成明显存在三方面的问题:(1)物能的形成和积压,是生态能超负荷转化,以生态能的严重赤字为代价“换来”物能的形成和积压。这既造成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平衡,同时也造成代际之间的“不平衡”,当代人“透支”了后代人的自然资源。(2)从整体来说,人的智能开发转化不足,仍以人的“体能”(或“本能”)转化为主,产品技术(智能)含量不高,集中反映在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国际竞争力差,反过来又直接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3)与上一点有紧密联系的是“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结构不协调。“自为需要”既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又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标志。相对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来说,“自为需要”程度偏低,“自然需要”程度偏高,就是说“靠天吃饭”的“自然需要”比重高,尤其是广大农村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个别地方还处在“靠天吃不上饭”的境遇。

总之,我国的“三维”增长结构不协调。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主要国家物质资本、生态资本、知识资本“三维”增长结构,即 K_1 、 K_2 、 K_3 平均大体是:73、4、23;瑞典是53、4、43;美国是65、6、29;而我国是89、2、9。这就是说我国的“三维”或“三种资本”有机构成不高,生态资本、知识资本增长比例偏低,均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更低于发达国家;而物质资本相对较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高于发达国家。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三维”增长结构,不同国家各不相同,一个国家不同发展历史阶段也不一样。所以,在一定经济发展时期,一个国家的“三维”增长结构究竟怎么安排合适,是尚需研究探讨的问题。而总的原则目标,可考虑参照我们

前面论及的“双循环”^{III}来设计、评估。

(三)我国“三维”增长结构的调整

总的原则是:在加快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增长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物质资本的增长,优化“三维”增长结构,提高“三种资本”的有机构成。

1. 大力发展知识资本生产。知识(资本)的积累,不仅表明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强大,经济质量的提高,国民智能结构的增强,“自为需要”水平的提升;同时也预示着经济增长内在潜质的增强。从“三维”增长结构“能”的转换来说,知识(资本)作为智能,是物(质)能增加、结构优化的基础,是生态能节约、替代、再生(废弃物的转换)、积淀的直接源泉。加快知识资本的生产,在我国当前主要是靠增加教育科研投资。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教育投资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9~5.2%,而我国最高的1998年才达到2.55%,大大低于国际水平。在科研投资方面,按国际惯例R&D投资占GDP的比例大于2%,创新能力才有可能比较强,而我1999年才达到0.71%,可是发达国家一般都在2%以上,美国2.83%,瑞典3.59%,而韩国是2.79%。1993年我国人均科研经费不足2美元,而美国是650美元。所以我国当前最现实可行的办法是:(1)加大教育科研投资的力度,发展教育科研事业,拓宽投资渠道,变国家包,为国家、企业、社会民间团体、个人多头并进;(2)教育、科研产业化,经营化,提高效率和质量;(3)彻底改革教育科研体制。总之,“资金”、“机制”、“体制”三管齐下。

2. 扩大生态资本生产。当前我国正处在“双循环”^{II},远未进入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尚未得到遏制。据专家预测我国要到2050年环境破坏才能实现“零增长”。生态危机已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据世界银行1998年测算,我国仅水、大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达540亿美元,占同期GDP的8%;每年水土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40亿元;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高达2300亿元;每年自然生态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3~6%,占全球同类损失的1/4。所以,加快我国生态资本“生产”刻不容缓。为此,需要:(1)在观念上要彻底端正对发展与环保关系的认识。在人类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由于在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条库兹涅茨倒U曲线,似乎“先污染后治理”就成了一种定式,所以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仍存在“环境优先”与“发展优先”之争,前者多为发达国家,后者多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两者之间,即发展与环保并重,并为逐步实现“环境优先”创造条件。其理由是:其一,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和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二,经过20多年的大发展与积累,已有相当的物质和科学技术基础;其三,人民群众有迫切要求;其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建立健全“环保经营”机制,促进环保产业化和生态财富资本化。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四项措施”,即加强对被破坏环境的治理,偿还“生态赤字”;实现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和“零的排放”;防御生态环境的自然(非人为)损坏;增加人工生态环境工程建设,营造人工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3)逐步增加环保投资。现在我国环保投资还不到GDP的1%,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达到2%,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将达到5~6%。

3. 在加快知识资本和生态资本增长的同时,积极推进物质资本增长。在“三维”增长结构中,物质资本的增长仍然处

在基础地位,是出发点和归宿。但是与传统“一维”增长范式有明显的不同:(1)要在机制和法律上保证物质生产过程逐步实现“零的排放”,“清洁生产”,即将昔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转嫁给社会的公共成本内部化。(2)物质生产单位的研究开发(R&D)投资要机制化、制度化。(3)物质生产部门要把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作为经常性的增长策略。这是因为人的“自为需要”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相应以满足人类“自为需要”为宗旨的经济增长过程,本质上就是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的过程。这也就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所提出的“增长极”原理。

4. 优化“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的比例结构,促进“三维”有机构成的提高。“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结构比例,不仅更综合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同时还反映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水平,如人类智能开发状况,人类自我解放的程度等,所以它是更深层次、最根本性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与“三维”增长结构相辅相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种需要”结构随之发生变化,而主要又是“自为需要”程度的提高。然而,人类“自为需要”程度提高的具体指标怎么设定,不同发展历史阶段如何评定,是尚待研究的问题。当前可利用一些间接指标来测度,如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综合反映人类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人文指数”等。当前我国市场化程度约为60%,比发达国家低约20~30个百分点;全球城市化水平平均约为50%,而我国约为30%;人文指数全球平均0.759,发达国家0.916,而我国只有0.594。显然,我国的上述指标都低于国际水平。所以,推进我国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人文指数等,不仅是提高“自为需要”程度,优化“两种需要”结构的基本途径,同时也直接有利于“三维”增长结构的调整。

5. 西部大开发,是优化我国“三维”增长结构重大战略措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大战略安排。当前西部开发的重点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生态农业,恢复自然生态平衡;发展科教事业,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智能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迎接经济的快速增长等。而这些正是调整“三维”增长结构、改善“自然需要”与“自为需要”比例关系最根本性的战略措施。

六、几点启示

“三维”增长范式的探讨,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

1. “三维”增长范式既是推进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也是沟通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内在联系的桥梁,从而也为构建和研究知识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范例。

2. 从经济人理念出发,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的理论观点,分析探讨“经济人假设”的变异和传统增长范式的更替,给我们的启示是,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要以人为本,要开拓经济人类学的研究。

3. “三维”增长范式体现了一种新的经济人理念、新的价值观、新的国民财富观、新的经济结构观,不仅对增长(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相关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4. 通过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分析“经济人假设”的变异和传统增长范式的更替等,给我们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既

为解读当今世界某些新的重大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推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范例。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国家创新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载《光明日报》,1999-11-05。

现在国际上还没有生态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直接统计,我们以20多个不同类型国家“三种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物质资本以固定资本形成额替代)间接测得三者的比例关系,大致反映一种趋势,仅供参考。

《光明日报》,2000-07-28。

《世界经济文化年鉴(1997/1998)》,1242、1251~1259页。

《光明日报》,1999-10-08。

参考文献:

1. 库恩,1980:《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 张夏华,1996:《现代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3. 杨春学,1998:《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 朱绍文,1987:《“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载《经济研究》,1987(7)。
5. 王东京,2000:《与官员谈中国经济》,载《光明日报》,2000-01-13。
6. 程恩富等,2000:《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 刘恩华,1997:《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8. 熊峰,2000:《利润最大化还是价值最大化——也谈公司的目标》,载《光明日报》,2000-04-04。
9. 杨敬年,1998:《人性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10. 吴刚,1999:《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思考》,载《光明日报》,1999-03-22。
11. 潘家华,1997:《可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2. 向恒,1998:《反贫困与人力资本投资》,载《当代财经》,1998(7)。
13. 陈志尚等,1998:《关于人的需要的几个问题》,载《人文杂志》,1998(1)。
14. 韩庆祥,1996:《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15. 袁志刚,1999:《知识经济学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6. 艾德文,1999:《复杂劳动与知识价值》,载《光明日报》,1999-09-27。
17. 白连生,1999:《知识资本:资本观念划时代的变革》,载《价格月刊》,1999(5)。
18. 黄锦奎,1999:《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作》,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N)